

哲元按此方案行事。此后，陆军省还制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试图建立一个与法币相联系的华北币制，通过吸收南京政府的资金来破坏币制改革的成果。

其次，以大规模走私破坏币制改革。关税是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源，为从关税上破坏币制改革的基础，日本支持进行大规模的华北走私活动。到1935年11月底，日本对华北的走私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利用“塘沽协定”，任意扩大解释，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和铁路海关执行缉私任务，使冀东海口大开，日本走私集团武装押运走私品出入华北，如入无人之境。大规模的走私使中国海关蒙受了巨大损失。据统计，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海关因走私受损达2550.6万元。<sup>①</sup>它直接影响了南京政府币制改革的基础。

中国的币制改革尽管遭到了日本的百般破坏，但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欧美列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南京政府统治区内，白银国有化顺利进行，法币流通正常，外汇比价稳定，生产回升，经济复苏，国力有所增强，这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日本阻挠中国币制改革的活动也以失败告终。

### 三 走向侵略战争的对华认识与行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步伐并没有止步，而是将侵略矛头伸向关内华北。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无路可退，竭尽全力阻止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对此，日本以军方为主，策划华北“自治运动”，驱逐国民党势力出华北，削弱南京政府对华北的控制，意欲把华北纳入日本的掌控之下。

---

<sup>①</sup>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3），朝日新闻社，1962年，第176页。

### 1. 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与分离华北

本来,国民党成立后,由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创立者与日本密切的关系,日本政府认为有利用的价值,故对国民党并不排斥。但1924年国民党“一大”对国民党进行大改组,实行国共合作,提出反帝施政纲领<sup>①</sup>,特别是1928年国民党政权再次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并将青天白日旗插到东北,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后,日本认为这威胁到日本的“满蒙权益”和在中国北方的“影响力”,日本政府特别是军部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恶化。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军方认为国民党的对外政策与日本的对华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国民党政权的存在阻碍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实现。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日本先是不愿承认,其后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也一直不顺畅。而军方还在寻找一切机会推倒国民党及其政权。这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历史根源之一。

1933年,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的概观》的调查报告,发给军官们参考。该书是这样认识国民党的:“国民党的北伐以同当时的军阀的妥协、拉拢而告结束。由此,北伐一旦完成,国民党就失去了目标,革命元气大为衰退。党堕落,党员腐败,官吏以卖官兼职为能事,财政混乱无序,苛政滥行与军阀时代无异,国民党不过是取代旧军阀现身的新军阀而已。而且国民党真正的统治,实质上仅限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并未能实现全国的统一。政客和新旧军阀依然争权夺

---

<sup>①</sup> 国民党的施政纲领中“对外政策”中宣布:(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二)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三)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四)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五)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六)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窃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购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势,热衷于争夺地盘,内乱依然连绵不断,根据利害关系‘合纵连横’这一‘支那国民性’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sup>①</sup>该报告代表了日本陆军界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基本认识。

这一时期日本军方的一些“中国通”也持有这种观点。陆军大将松井石根 1935 年视察中国后认为:“同领土广大、民情自然不同——支那现在立刻由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实现完全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是非常艰难的——作为支那统一的过渡,最好是将其分为北、中、南、外部四种地方,采取联省自治、中央统制的形式比较自然。”<sup>②</sup>另一名陆军高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矶谷廉介少将(1935 年春转任驻华武官)也认为,妨碍日中关系安定及造成中国内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指导精神”。他认为国民党领导层在第三国际的引导下,把纯粹的“国民革命”“诱导”成“共产革命”。只要国民党领导层的这一“指导精神”不改变,中日关系和中国内乱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sup>③</sup>

华北分裂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关东军参谋土肥原贤二也认为,“过去日支亲善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将全体支那作为统一的一个国家对待造成的。与各个政权合作,并让各个政权进行适当的调和,才是向着最为实际的合作之途迈进的方法”<sup>④</sup>。而另一个跟军部关系密切,被尊为军方“智库”的大川周明,也认为南京政府只代表国民党的私利,领导排日,与军阀并无两样,只能是一个过渡政权,在完成破坏任务后走向没落。为此,1935 年他指导他掌控的《东亚》杂志,将编辑方针确定为“打倒蒋政权”<sup>⑤</sup>。

① 户部良一:《日本陆军和中国——“支那通”的幻想和破灭》,讲谈社,1999 年,第 178 页。

② [日]《东京日日新闻》,1935 年 12 月 12 日。

③ [日]波多野澄雄:《日本陆军的认识——从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井上清等编:《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原书房,1988 年,第 233 页。

④ [日]《东京日日新闻》,1936 年 4 月 14 日。

⑤ [日]吴怀中:《大川周明与近代中国——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与行动》,日本桥报社,2007 年,第 161 页。

总之,直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军方仍不愿承认国民党政权的正统地位,并策划各种阴谋,意在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此后日本实施的分裂华北活动就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应该说,日本军方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认识有些是“误解”,但更多的是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障碍,故罗织罪名,将其打倒。所以,反对国民党政权与分裂华北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上述对华观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12月,日本三省(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会议制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它规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原则是:(1)“使中国追随帝国,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确保东亚和平”;(2)“扩张我国在中国的商权”。<sup>①</sup>该文件具体提出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对华北的政策。该文件认为,国民政府的指导原则与日本的对华政策根本不相容。为此提出了分裂华北的政策,目标是使该地区“出现南京政权政令不达的局面”,在该地区建立“日满华的特殊关系”。同时,该文件还决定进行分化南京政府地方势力关系的活动,以牵制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这份全面而系统的文件,成为日本新的对华政策的纲领性文献,较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军政各派的对华方针。

根据《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的精神,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从1935年春开始具体策划侵占华北的计划,即先把南京政府及国民党的势力驱逐出华北,然后扶植亲日的傀儡政府,把华北变为日本控制下的第二个伪满洲国。5月、6月,日军强迫中方承认“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党部及中央势力被迫从河北、察哈尔撤出,为日本操纵地方军阀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搞“自治”创造了条件。

9月24日,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公开宣扬分裂华北。他宣称:为了把华北建成“日满支”合作之基础,不惜以

<sup>①</sup>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8 日中战争(一)》,美铃书房,1964年,第22—24页。

武力排除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权。多田还提出了中国驻屯军关于华北问题的三项要求：“(1) 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北支；(2) 北支经济圈独立；(3) 北支五省开展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实现上述要求，多田提出“必须改变并确立北支政治机构，当前须指导组织北支五省联合自治体”<sup>①</sup>。多田的谈话，实际成为日本推行“华北自治运动”的前奏。

军部对在华日军分裂华北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10月4日，川岛陆相提出的《鼓励华北自治案》在内阁会议上被通过。这使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分裂华北的气焰更为嚣张。11月11日，日军方代表土肥原向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以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在华北实行军事、政治、经济的高度自治，与日满结为一体，仅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权。土肥原还以武力相胁迫，要求宋哲元以11月20日为最后通牒期限，按日本的要求实行华北“自治”<sup>②</sup>。为策应土肥原的分裂活动，关东军出兵一个师团兵陈长城一线，中国驻屯军也诉诸武力恫吓。华北陷入了危急之中。虽然最后中日双方达成妥协，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聘用日本人担任顾问，但华北的危局并没有消除。1936年，日本政府和军部先后制订了两期《处理华北纲要》，把分裂华北确定为国策。

## 2. 中国统一与日本“对华认识再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片面的轻视中国的对华认识占据了主流。但日本还是有些有识之士不仅看到了中国国力的发展，还意识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国家统一的大势。特别是1936年12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日本的对华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对中

<sup>①</sup> [日]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92年，第88页。

<sup>②</sup> 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中正书局，1982年，第613页。

国的内政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对华再认识”的讨论。

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日本最为恐惧的是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后联苏对日,那样日本苦心经营的“满蒙”将腹背受敌,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获取的“权益”将受到巨大威胁。为此,一部分日本高层人物希望放松对中国的强压政策,改善日中关系,避免中苏联手。在此形势下,在对华关系上走进死胡同的广田内阁倒台,1937年3月,“佐藤外交”登场,倡导对华“平等外交”,还提出停止华北分裂政策。中日关系出现一丝改善的“景象”。

部分军界中的“中国通”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统一,重新认识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参谋本部派驻华大使馆的大佐楠木实隆在1937年2月与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本田忠雄会谈后,达成如下“对支政策意见”并向军部谈了他的对华认识:

纵观中国现状,反中央各派虽尚存,但无论哪派都无法彻底地颠覆现中央政府,各派在现任政府组织机构内安插自己一派的势力。因此,我方若徒劳缚于推翻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或分裂华北五省等旧观念,势必适得其反。深信应迅速改变旧式观念,堂堂正正地以中央政府为对象进行邦交。不以南京政府为对象,通过威逼利诱地方政权搭建日支邦交的外交政策,是只知日清、日俄战争时代的支那,而不知中国现状的表现。<sup>①</sup>

另一名有过驻华经历的陆军省新闻班军官雨宫巽中佐也感慨地说:“很遗憾,现在的南京政府已经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的贫弱,无论是统制力还是军备都已不可忽视,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日渐强化中,——蒋介石的人气也一天比一天增长”。日本“靠恫吓或口头威胁已经几乎不能胁迫南京政府”。<sup>②</sup>

① [日]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 8 日中战争(一)》,第 389 页。

② [日]雨宫巽:《赤裸裸地看日支关系》(1937 年 4 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网站(<http://www.jacar.go.jp/>)公开。

楠木实隆和雨宫巽的对华认识代表了一部分军部中坚军官及部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对华认识或对华认识的转变,但这种比较客观的对华认识没有形成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政界、财界和军界的主流”对华认识并未根本改变,他们“否认中国的民族统一,否认以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的统一,以分割中国或者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为目标”。这种主流的对华认识是日本对华认识的“坚硬根基”。<sup>①</sup>

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客观上是对日本维护并扩大侵华权益的威胁,是日本不能接受的。“佐藤外交”在表面上使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中日本质矛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日本希望在维护日本现有对华侵略权益的基础上对华“亲善”,而中国则要求日本在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的基础上谈中日“亲善”,如先行撤销塘沽、上海停战协定,日本停止对华北主权的侵害等。但中国的这些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要求在日本看来是“排日政策”,日本断不能接受。所以,“中国再认识论”也好,“佐藤外交”也好,都不可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根本的改善。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国民政府不再对日本的侵华行动逆来顺受的局面下,日本国内特别是军方高调“教训一下支那(对华一击论)”的观点很快就占据主流地位。

作为第三者的英美人在分析日本的对华认识和对策时也认为:“如果支那取得了与日本同样的进步,日本将一触即溃。深知这一点的日本,不可等闲视之。要么在支那进步之前尽快将其击溃,否则就必须尽量防止其进步,将其始终放置在从属自己的劣等国的地位上。”<sup>②</sup>应该说,英美人的这种观察一针见血,揭示出了日本军方、政府及部分民众面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心态。上述各种对华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特别是军方的对华行动选择,并使日本最终走上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

① [日]西村成雄:《“中国统一化论争”的历史认识》,《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3期,第96页。

② [日]日本外交协会:《对支外交问题讨论摘要》(1937年3月25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亚洲历史史料中心网站(<http://www.jacar.go.jp/>)公开。